

1938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背景與動機

—— 一個研究的綜述

◎ 李建勇

正如美國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R·施拉姆教授所說，「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末提出的種種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膽地體現了他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以及中國人需要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信念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了。」¹同時，要想「精確地說出『中國化』在1938年對毛澤東意味著甚麼，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²迄今，海內外有關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於1938年毛澤東提出這個著名的概念的背景、動機進行了研究。茲將若干有代表性的觀點綜述如下：

一 毛澤東的個人文化背景：毛澤東早年文化經歷、文化觀與他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為是一個含有文化特點的用語，從文化構建、理論創新視角來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前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當然是有充分根據的：外來的思想文化在移植時發生「民族化」，本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常軌；近代以來中國又處於激烈的中西文化相互作用的宏觀背景之中；毛澤東193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論述中，也的確包含著要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內容具有中華民族文化的形式，同時整合中華民族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之文化和理論意義（這些思想他在1939年的《新民主主義論》、1956年《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著述中有新的論證）。³而且，作為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有著遠大歷史使命感的領導者，毛澤東在抗戰之初便曾有如此表白：中國革命鬥爭如此偉大豐富，應當出理論家；馬克思主義是空前而不絕後，「說中國不能出馬克思，我不相信」，將來會有馬克思的「兒子」、「孫子」、「孫孫子」的「新馬克思主義」，⁴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偉大志向，躍然紙上。

如果把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整風運動、1945年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這些歷史事件連結起來，得出這樣一個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並不困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概念，是「打開創立毛澤東思想之門的理論鑰匙。」⁵「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直接產物。」⁶而另據1954年起任職毛澤東國際問題秘書12年之久的林克介紹，毛澤東十分推崇把印度佛教中國化、簡易化，創立了南宗禪的六代禪宗慧能。林克認為毛澤東至少在其晚年是把慧能的「佛教中國化」與他所宣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相類比的，都是要把外來的文化與中國特殊的文化品格相融合。⁷今天，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之理論成果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括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等觀點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

如此，就有必要對於毛澤東在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前的文化經歷和觀念與他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從研究毛澤東個體思想、文化觀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講，如果缺失這一環節，就會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毛澤東那里變成一個橫空出世、而不是合乎邏輯發展演變的概念。施拉姆教授和中國學者陳晉等人溯及毛澤東的早年，探討了他的早年文化經歷、文化觀與他所宣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間所存在的邏輯關係。施拉姆教授認為：毛澤東在五四時期已經形成了融中西學為一體的思想傾向；毛澤東早年創辦的「自修大學」設在船山學社，也決非一個偶然的枝節問題；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後在毛澤東領導下所形成的中國革命道路的象徵。因為『自修大學』雖然極其強調新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但也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化傳統，其中特別包括像王夫之這樣的持批判態度的唯物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家。中國共產黨許多未來的幹部，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毛澤東在參加那裏舉行的各種討論會的過程中，繼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基礎。⁸

陳晉對此評論說，用這樣一個例子說明從這個時候起毛澤東便開始著意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難免有些誇大，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種文化選擇和創造思路，毛澤東在青年和中年確實是一致的。青年毛澤東在文化創造和選擇實踐中，受楊昌濟先生的教誨和影響（楊主張「將合東西兩洋之文明一爐而冶之」⁹），對於中西文化，注重二者的結合，不走極端，著眼於現實的需要和可能，形成了先中後西、先內後外、先實踐後理論，進而取西資中的文化吸收、選擇和創造觀念，「青年毛澤東的取西資中的目的是，先要有一種作為旗幟和指導思想的『主義』，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吸取古今中外有用的東西，建立一種嶄新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必須產生於、適用於中國的具體實踐。」¹⁰這種文化觀為他日後建構自己的思想理論，為他日後在政治活動中的成功，為他日後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論基礎。

上述認識，一直到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也沒有改變，並提煉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實踐——理論——實踐」的文化創建經典公式。所以，可以把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看作是把他青年時代還不十分明晰和自覺的中西文化觀上升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的發揮。¹¹應當說，這些分析有助於我們對於毛澤東個體思想演變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做到精細準確的把握，避免把1920年夏「初步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及以後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與早年毛澤東的思想方法與文化觀割裂開來。

當然，應當明確的是，作為一個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格的政治家，毛澤東進行理論思考和創作的中心和重心，並不在於要去刻意建構一個甚麼理論體系，而是通過吸取馬克思主義及優秀傳統文化，來思考、解答中國問題。他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如下文分析，亦是如此。

二 歷史文化背景：新啟蒙運動及抗戰時期「中國化」思潮的興起與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與抗戰前後影響一時的新啟蒙運動及抗戰時期濃厚的「中國化」氛圍都有著一定的關係。具體來講：

(一) 所謂新啟蒙運動，是20世紀30-40年代北京、上海和重慶等地，在「新啟蒙運動」口號下，由共產主義理論家和左翼知識份子發起，以弘揚五四精神為旗幟進行的有關思想、文化和組織活動。¹²新啟蒙運動的初衷是批判日本侵略者、漢奸對傳統道德的消極利用以及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的尊孔復古的保守文化政策，後來的發展則是要積極主動地用批判的精神把中國固有的東西從侵略者那裏接過來，並賦予其積極的意義。新啟蒙運動的參加者在宣導文化之民族性的基礎上，比較多地使用了「中國化」的概念¹³：陳唯實、張申府在1936年便分別提出了「辯證法之實用化和中國化」、「科學中國化」等主張。陳伯達（為新啟蒙運動的始作俑者）、艾思奇在抗戰爆發後到達延安，繼續致力於「中國化」的宣傳，後者於1938年提出「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運動」；美國學者雷蒙德·懷利考察認為，陳伯達對於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陳「為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踐的統一起來提供了口號以及基本原理rationalé（不是基本概念，這是毛澤東自己獨立闡明的），他推動毛澤東正確地評估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歷史遺產採取一種更積極態度的必要性。」¹⁴

(二) 抗戰時期的「中國化」思潮，其產生的社會歷史原因則頗為複雜：

1、從宏觀歷史背景來看，中國化思潮之興起，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社會發展路向選擇有著密切的關係：鴉片戰爭是中國封建的傳統社會邁向近代社會的起點。在這個歷史起點上，既有西方堅船利炮的威脅，也有中國朝野激烈的文化論爭。文化論爭的首要問題是：祖宗之法能不能變？爭論的結果是祖宗之法可以變。這表明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王朝危機四伏。洋務派提出「中體西用論」以求應變危局，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清王朝面臨的亡國困境。隨之，「全盤西化論」出籠並在五四時期達到高潮。當時多數人把我們今天所稱的「全盤西化論」稱之為「世界化」。相當多的五四精英競相鼓吹「世界化」，積極引進西方各種學術和思想，試圖徹底改造中國文化以便與世界接軌。然而，「先生」總是不放棄打「學生」，「學生」學來的救命「西學」也多是支離破碎的一鱗半爪。人們從迷夢中驚醒，開始了反思，不同文化主張激烈碰撞和交鋒，難分伯仲。這種情況前後相繼持續了十多年的時間。

2、從具體的歷史背景來看，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同時也改變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大而弱的中華民族不僅要築起軍事的國防，物質的國防，而且也要築起精神的國防。強調中國特色，弘揚民族傳統的「中國化」思潮由此應運而生。抗日戰爭重新整合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心理結構，強化了民族意識，喚起了傳統文化的復興。以此為契機，「中國化」思潮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替代曾流行一時的「全盤西化論」成為文化發展主流。頌揚民族文化傳統的聲浪，幾乎淹沒了五四以來自由主義學者「全盤西化」的夢想。

從學術角度講，抗戰時期形成的「中國化」思潮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將西方的思想與學術進行改造，使之變為中國特有的形式，或者使之能夠適用於中國的特殊環境；二是發揚光大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學術，以便與西學相抗衡。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中國化」思潮指的是當時瀰漫於中國社會的那種熱切追求「中國特色」的心理傾向和思想共鳴。¹⁵「中國化」思潮具體表現為三民主義儒學化、新儒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個不同的發展路向。不同的路向，有著不同的歸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路向，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鬥爭實際相結合，正確解決了中國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找到自己的表現形式。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

東思想的形成，重構了中國文化結構，重塑了中國文化精神，成為中國新文化開始形成的重要標誌。¹⁶

簡言之，新啟蒙運動和中國化思潮可視為是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並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歷史語境（Historical Context）。¹⁷所以，當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命題之後，便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共鳴。張申府便稱許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映了思想界的進步潮流，「不但是對的，而且值得歡喜讚歎」，「更可以象徵出來中國最近思想見解上的一大進步」。毛澤東的話，「意思與新啟蒙運動的一個要求完全相同」。因為「新啟蒙運動很可以說就是民族主義的科學，民主的思想文化運動」。¹⁸

三、黨的成長背景：蘇共、共產國際及黨內教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嚴重影響及其反思與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

中國革命是在極其複雜的國際國內關係格局中進行的。關於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複雜關係和黨內教條主義者對於黨的事業造成的嚴重損失，這是毛澤東等黨的領袖、黨史學界討論頗多、同時也是人們相對熟悉的一個話題。在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學界對此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一般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針對30年代在中國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的傾向而提出的。

之所以出現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複雜影響、之所以中國共產黨黨內長期存在著對於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教條主義的錯誤，綜合地看，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1、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組織上二者是下級和上級的關係，按照共產國際的組織規則，不僅中國共產黨必須「無條件地遵守最嚴格的國際紀律」和「毫不遲疑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任何指示，而且還必須接受共產國際派出的具有「最廣泛的權力」的全權代表的監督和指導。所以當蘇共領導人及共產國際公開地要求各國共產黨必須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來保衛社會主義蘇聯的安全，使自己國家的共產黨實現「布爾甚維克化」，要求他們必須無條件地「從事分析和運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國革命中取得的經驗」時，便不能不對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嚴重的影響。

2、中共黨內所存在「以俄為師」的思維定勢。時代和國際環境讓中國共產黨明確了「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不對中國共產黨產生極大的榜樣示範作用，中國共產黨人所接受和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充滿了俄國的味道」（比如，毛澤東曾斷言：「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為中心的材料。《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¹⁹就此意義上來講，毛澤東所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是「馬列主義中國化」，其中的「馬克思主義」包含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來自俄國的革命理論、經驗、模式和人財物等援助，在大大滿足了黨初期發展需要的同時，也使黨內一部分領導人形成了完全按照俄國人的方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孔步亦步，孔趨亦趨」的「以俄為師」的心理。

3、從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來看，理論素養欠缺，文化的落後，「以為上了書的都是對的」，本

本主義的認識路線，缺乏革命的具體實踐經驗因而缺少對於中國革命的發言權，黨內民主制度的不健全等黨的建設初期的幼稚表現，以及整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似的社會大環境，都不能不對黨正確處理與蘇共、共產國際的關係產生影響，並導致黨內產生教條主義（以及它的另一個極端經驗主義）的產生。²⁰在這種歷史情形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顯然應被視為是一個具有明確政治指向的生機勃勃的戰鬥口號。楊奎松指出，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其一是要根本改變蘇聯和共產國際控制和指導中國革命的局面，以便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經驗來決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其二是要根本改變迷信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經驗和指導，以及迷信那些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情況，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創造性地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²¹

總之，與毛澤東1930年所提出的「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思想相一致，「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用以擺脫蘇聯人控制，決心根據中國革命利益的實際需要，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命運的一面旗幟，是向那種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主義」原則提出的強有力的挑戰，其鋒芒所指是黨內的唯蘇共和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教條主義者，顯示了毛澤東非凡的政治智慧。²²把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放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加以考量，我們便不難理解毛澤東論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段經典論述中的「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等話語的政治內涵了。畢竟我們不能忘記：毛澤東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提出的命題當然是不可能純粹只具有文化的意義——雖然正如前文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等話語的確有其重要的文化意義。

四 黨內鬥爭背景：黨內鬥爭因素與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關係

某些研究者出於意識形態偏見或其他原因，斷言毛澤東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出於爭奪權力需要，表現出明顯的傾向性。澳大利亞學者尼克·奈特在一篇文章中介紹說，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的一個花招，旨在同緊跟莫斯科的留俄派進行的權力鬥爭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因為留俄派支持歐洲人和蘇聯人比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例如，在羅伯特·諾斯看來，毛澤東『修改了俄國的共產主義政治理論，以適應中國的特殊需要，並便於他本人登上權力寶座』」。²³中國大陸學者高華在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中，著重從黨內鬥爭角度分析了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原因及其動機。作者雖然認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幹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但同時又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毛澤東經長期醞釀，為徹底打倒王明和黨內的留蘇勢力，剷除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對史達林的崇拜，最終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導師」地位，而提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口號。

具體來講，1935年後，毛澤東逐漸控制了中共的實權，進而迫切需要創造一個在理論上能為自己自圓其說的解釋系統。同時，熟知中國傳統的毛澤東也深知，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僅手握兵符還不夠，還需要成為能為廣大追隨者提供精神資源的「導師」。換言之，有「君」之實，而未有「師」之名，是令毛澤東深感缺憾的。於是，怎樣創建「師」之理論體系，如何使之達到「君師合一」，就成為長期困擾毛思緒的一大難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僅表明毛澤東的解釋系統已初建成功，而且標誌著毛澤東為確定自己的「導師」地位而進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毛澤東為自己所

有「異端」觀點尋找到解釋的依據，它集中體現了毛本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構成了漸趨成型的毛主義的理論核心。²⁴

雖然如前文所述，毛澤東的確有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意願，重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問題的確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²⁵與王明等人為代表的「國際派」之間的黨內鬥爭也確實是促使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一個直接的重要的不應該回避的因素，但這種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為毛澤東純粹為了追求和鞏固個人權力手段的觀點顯然與歷史事實偏差太大，是站不住腳的，難以為我們所認同。²⁶高華還認為，「伴隨這個口號，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消極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體內，給黨自身帶來了長期的困擾。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論的準備，黨內一直存在著輕視理論的根深蒂固的傳統。1927年後，中共長期戰鬥在落後的農村邊遠地區，其階級構成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的比重在黨內佔了壓倒優勢，早已養成農村軍事性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²⁷

不可否認，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應注意防止用傳統文化來解釋、比附馬克思主義，造成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扭曲理解，但把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消極因素對於黨的建設及革命事業的消極影響歸咎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念，筆者認為，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事實上都是很很不恰當的：姑且不說毛澤東至少在民主革命時期一向對於絕對平均主義等傳統的消極文化觀念有著鮮明的警惕和防範，也不說毛澤東對於「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傳統文化向來強調「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華」，但就只是從生活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無可選擇性的角度來說，即使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又有誰、有哪個政黨能夠對於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消極因素做到完全「免疫」呢？畢竟，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

高華的另一個觀點則值得肯定：「『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創造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的空間，它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²⁸的確，單就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背景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此前中國共產黨那種「武裝保衛蘇聯」等「國際主義」的理念相比，當然更能適應抗戰前後國人日漸覺醒的民族主義意識，確立黨的政治合法性地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說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歷痛苦的實踐，懂得正確處理民族利益與無產階級「階級利益」關係的日益成熟的政治表現。

五 小 結

施拉姆教授認為：「『中國化』的概念是一種象徵，面對共產國際那種盛氣凌人的態度，它伸張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因此，它的價值不僅在於黨內鬥爭的一種武器，而且可以作為一種口號，在民族危急關頭用來迎合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就毛澤東而言，它還反映出一種發自內心的信念，即歸根到底，一種源於西方的意識形態，如果不能適應中國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狀態而作出改變，就不可能在中國的環境中發揮作用。」²⁹筆者以為這個評價是比較恰當的，即：毛澤東193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是中國共產黨謀求獨立自主地位的一面旗幟，是黨內鬥爭的一種武器，同時，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它還是構建適應於中國

環境的「新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象徵，適應於抗戰時期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氛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便應運而生了。

葛蘭西曾有言：一個搞政治的人進行哲學寫作：情況可能是，他的「真正的」哲學反倒應該在他的政治論著中去尋找。比照這句話，大概可以這樣說：毛澤東193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對其內涵和意義的理解，當然不應該局限於他在《論新階段》中的論述，而應該在他的所有論著中和這些論著產生的歷史環境及其深遠影響中去尋找。上述海內外有關學者對於毛澤東1938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討論，視角各異，有些富於深刻的洞見，有些則過於偏執。但不管怎樣，這些觀點應該是有助於我們以多維視角，從廣闊的歷史背景獲得對於這一問題全面的、立體的認識。同時，也應該有助於糾正目前那些對這一命題進行形而上學的解讀、甚至把許多個人主觀觀點強加於這一命題之上的研究範式。同時應指出的是，在今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在中國政治生活和理論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的重大而深刻的命題，已經擺脫了它的某些特定的歷史內涵而獲得了新的時代意義——這是不言而喻的。

註釋

- 1、2、29 [美] 斯圖爾特·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田松年等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71；72；71-72。
- 3 曹泳鑫，吳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與構建範式——從毛澤東「38命題」、後續闡述到當代化「鏈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頁8-10。
- 4 石仲泉：〈抗日戰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匯報》，2005年8月15日。建國後毛澤東希望結合中國國情來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所貢獻的願望仍然很迫切，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宣稱：「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我們）不自覺。」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早期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117。
- 5、6 [美] 雷蒙德·懷利 (Raymond F. Wylie)：〈毛澤東政治權威形成的歷史氛圍〉，載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2卷：從奠基者到「紅太陽」（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頁209；210。
- 7 林克口述，王凡采寫：〈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人物傳記》，2007年第6期，頁9-10。
- 8 [美] 斯圖爾特·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頁46。
- 9 楊昌濟：〈勸學篇〉（1914年），《楊昌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頁203。
- 10、11 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頁102；92。
- 12 俞紅：〈論新啟蒙運動〉，《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頁110。
- 13 「中國化」這一概念出現和使用的範圍的時間更早、更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很可能是受到「五四」以來思想界、學術界引進外國學說應該「中國化」的思路的影響。見張靜如：〈關於「中國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5期，頁73-74。
- 14 [美] 雷蒙德·懷利 (Raymond F. Wylie)，林育川譯：〈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現代哲學》，2006年第6期，頁60。
- 15 毛澤東在《論新階段》那段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中，先是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後又有「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等反覆強調「中國」特色、充

- 滿民族自尊感的話語。《中共中央檔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658-659。
- 16 參見馮崇義：〈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化思潮〉，《開放時代》，1998年第2期，頁73-79；張立慧：〈抗戰時期的「中國化」思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38-42。
- 17 參見陳亞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新啟蒙運動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05），頁3、頁137-142。
- 18 張申府：〈論中國化〉（1939年2月20日），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588。
- 19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02。
- 20 參見張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早期若干不利傾向分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1年第4期，頁23-24；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1-19。
- 21 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頁412。
- 22 張國燾在談到毛澤東與王明之間的分歧與鬥爭時亦曾有言：「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421。
- 23 〔澳〕尼克·奈特（Nick Knight），王應一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頁91。
- 24、27、28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178-179；182；180。
- 25 早在1920年11月，毛澤東便強調，要改造中國，必須「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附」，毛澤東：〈致羅璈階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554；到了1962年他又曾總結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紅旗》，1967年第9期，頁21。
- 26 雷蒙德·懷利指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僅僅視為毛澤東用於在黨內爭奪權力的工具，這是不公平的。它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認真地嘗試以一種大眾化的方式去向中國廣大民眾介紹一種複雜的外來的意識形態。他們希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能夠促使中國人民認同這種新的學說，而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把它當作一種方法用以研究自己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簡潔地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將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探索的探索。參見〔美〕雷蒙德·懷利，林育川譯：〈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頁60-61。當然，亦應當承認，中共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確可以視為是中共毛澤東思想化，而到了毛澤東晚年也存在著因為過去輝煌的歷史導致過分自信，長期的領袖地位和備受擁戴的現實導致他習慣於指導黨，將黨內正常的不同意見簡單地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斥之為「修正主義」，把自己看成是「黨的化身」、「馬列主義的化身」的問題。

李建勇 青島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與教學。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一期（2008年2月29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